

成都市高校学生道德发展水平研究

——以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为例

□刘 荃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 610059]

[摘要] 以马克思的道德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结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DIT2和MJT量表为计量工具,在成都市的4所高校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在中国高校的适用性。研究表明:4所高校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总体状况令人乐观;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且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家庭收入呈负相关,和父母职业有较弱相关,和家庭居住地方没有显著相关。为此,高校要在科学评价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基础上,提高教师的道德推理水平,关注大学生道德水平的环境成因,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以促进大学生道德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 大学生; 道德发展水平; 环境因素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1)05-0094-05

一、研究目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大学生道德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大学生如何适应社会环境变化,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是当今学校德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来了解当前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探索当今大学生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影响大学生道德发展的相关因素,寻求提高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方法途径,为高校道德教育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研究假设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发展是呈阶段性的,分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三个阶段。道德认知水平的发展是个体道德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知行不一致的问题,科尔伯格的研究发现:个体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水平越高,道德判断与行为的一致性程度也就越高。因此,可以通过测量个

体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水平来推断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

关于道德的形成和发展,科尔伯格认为,个体道德的发展是通过个体的主观世界在社会文化环境作用下主动改变来实现的。家庭的道德氛围、家庭环境和家长的道德发展水平会对个体的道德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本研究以此理论为基础,运用DIT2和MJT量表,对成都四所高校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以下欲讨论的研究问题与假设:

问题:当前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的总体状况如何?

假设一:一个人的道德认知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假设二: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环境具有相关性

三、研究步骤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大一至大四的本科学生,在成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Oct.2011,Vol.13,No.5

都地区的4所高校: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以分层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662个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为了便于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本研究选择了课堂发放问卷的方式,由担任该课的助教帮忙于下课前发放问卷,当堂回收问卷。发出的问卷共计700份,回收662份,利用两表的M检测项,剔除72份无效问卷,获取有效问卷590份,回收率为97%,有效率达89.1%。

表1 样本分布表

变量	频次	缺省值	百分比			
男	415		62.7			
女	247		37.3			
大一	51	289	13.7			
大二	95		25.2			
大三	161		43.2			
大四	66		17.7			
家庭环境						
	父	母	父	母	父	母
硕士以上	16	11	19	20	2.5	1.7
专科及本科	187	149			29.1	23.2
中学	369	363	14	16	57.4	56.6
小学	69	118			10.7	18.4
机关事业单位	140	83	14	16	21.6	12.8
国企	117	112			18.1	17.3
外企私企	102	91			15.8	14.1
下岗	37	50			5.7	7.7
农民	135	158			20.8	24.5
其他	117	152	18.1	23.5		
家庭经济收入及家庭居住地						
5000元以下	200	56			33.0	
5000元~1万	136				22.4	
1~3万	156				25.7	
3~6万	68				11.2	
6万以上	39				6.4	
农村	168	18			26.1	
小城镇	131				20.3	
中等城镇	194				30.1	
大城市	151				23.4	

N=662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莱斯特(Rest)发展出的封闭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s Test, DIT2)程序来测试被试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使用林德(G. Lind)设计的道德判断能力测验(MJT)量表来测试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

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利用频次分析方法对被试的道德认知水平P分数和道德判断能力P分数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皮尔森(Pearson)简单系数分析方法对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环境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

1. 大学生道德发展水平的总体状况

成都市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前习俗水平比例分别为12.7%和14.7%;习俗水平分别为57.6%和56.9%;后习俗水平分别为26.3%和28.3%。也就是说,大部分大学生处于中等水平,值得欣慰的是高水平的比例远高于低水平的频次和比例。

2. 道德认知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的一致性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中,道德发展处于习俗水平阶段的人数占据最大比例,而后习俗水平发展阶段的比例又大于前习俗水平。这也比较符合柯尔伯格的有关论断:大部分大学生的道德推理水平处于习俗水平发展阶段,见表1。

表2 道德认知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之频次分析

		P分数	频次	百分比
认知水平	前习俗水平	0~0.15	75	12.7
	习俗水平	0.20~0.45	360	61.1
	后习俗水平	0.50~0.95	155	26.3
判断能力	前习俗水平	0.22~0.31	96	16.3
	习俗水平	0.32~0.41	320	54.2
	后习俗水平	0.42~0.67	174	29.5

N=590

从表2、表3中能够直观看到: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与道德认知水平在三个水平上分布基本相同。从人数的分布来看,两者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表3 道德认知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之一致性分析表

道德发展水平构面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道德认知水平 N=590	0.3662	0.17187	00	0.95
道德判断能力 N=583	0.3690	0.0559	0.22	0.67

N=590

3. 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性(见表4、表5)

(1)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硕士及以上组的被试的前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的比例最小, 分别为 6.3% 和 12.5%, 习俗水平的比例最高, 为 75%; 大专本科组: 被试的后习俗水平和前习俗水平比例最高, 达到了 31.2% 和 15.6%, 而习俗水平的比例最低, 为 51.4%。

(2)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父母的职业的关系: 机关事业单位的后习俗水平比例最高, 分别为 30.5% 和 36.7%。下岗待业组的后习俗水平比例最低,

分别为 21.2% 和 18.2%。企业组的该比例略高于农民组。

(3)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收入的关系: 低水平收入组的前习俗水平的比例最小, 分别为 9.8% 和 10.0%; 而高水平收入组的该比例却最大, 分别为 17.1% 和 28.6%; 低水平收入组的后习俗水平的被试比例最高, 分别为 27.3% 和 34.3%; 高水平收入组的该比例却最小, 分别为 14.3% 和 17.1%。

(4)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居住地之间的关系: 来自中等城市的被试前习俗水平的比例最小, 分别为 4.6% 和 8%; 后习俗水平的比例最大, 分别为 26.3% 和 36%。但是, 4 个组的频次分布没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 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和家庭收入呈负相关, 与父母职业有较低正相关, 和家庭居住地方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4 家庭环境与道德发展水平关系之频次分析表(1)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职业			
		硕士以上组 N=16	大专本科组 N=176	初高中组 N=320	小学组 N=64	机关事业单位 N=128	企业 N=218 (198)	下岗 N=37 (33)	农民其它 N=130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道德认知水平	前习俗水平	1 6.3	28 16	33 10.3	8 12.5	13 10.2	27 13.6	3 9	13 10
	习俗水平	11 68.8	92 52.3	202 63.1	44 68.8	76 59.7	112 56.6	23 69.7	78 60
	后习俗水平	4 25	56 31.7	85 26.6	12 18.8	39 30.1	59 29.8	7 21.3	39 30
道德判断能力	前习俗水平	1 6.3	25 14.2	36 10.2	12 18.8	17 13.3	36 18.2	9 27.3	22 16.9
	习俗水平	12 75	112 63.6	192 60	32 50	64 50	97 49	17 51.5	76 58.5
	后习俗水平	3 19	39 22.2	102 29.8	20 31.3	47 36.7	65 32.8	6 18.2	32 24.6

表5 家庭环境与道德发展水平关系之频次分析表(2)

		家庭收入			家庭居住地			
		低水平 N=329 (297)	中等水平 N=222 (206)	高水平 N= 39 (35)	农村 N=168 (144)	小城镇 N=131 (118)	中等城镇 N=194 (175)	大城市 N=151 (138)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道德认知水平	前习俗水平	30 10.1	35 17	6 17.1	19 13.2	21 17.8	9 4.6	25 16.6
	习俗水平	186 62.7	115 55.8	24 68.6	92 63.9	68 57.6	115 59.3	75 49.7
	后习俗水平	81 27.3	56 27.2	5 14.3	33 22.9	29 24.6	51 26.3	38 25.2
道德判断能力	前习俗水平	29 9.8	57 27.7	10 28.6	29 20.1	18 15.3	14 8	19 13.8
	习俗水平	138 46.5	113 54.9	19 54.3	75 52.1	59 50	98 56	80 58
	后习俗水平	102 34.3	60 29.1	6 17.1	40 27.8	41 34.7	63 36	39 28.3

N=590

五、讨论

家庭是获取社会经验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最早介入和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早期家庭经验对个体的道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家庭在个体的道德发展中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以及哪些因素和个体的道德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1.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呈现出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

据频次分析结果表明,除硕士及以上组以外,整个样本的道德发展水平的分布呈现出低水平的比例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而高水平的比例则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呈现出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进一步利用相关分析方法来考察个体道德发展水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0.324和0.421。这也印证了我们的假设: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推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掌握促进孩子的思维、推理水平发展的有效方法。更能够理性地给予孩子一些道德角色的承担机会,从而使得孩子获得了更高的道德发展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通过教育获得的道德认知水平与形式推理能力就越强。父母在家庭生活中把自己的道德认知与道德推理能力通过有效的家庭教养方式传递给孩子,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的表率示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也就是说,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代表着他们所具备的道德认知和推理水平的高低,还预示着他们将把这些道德观念、道德认知以及道德推理能力传递给孩子的能力的高低。但是,硕士以上组例外。我们可以从样本分析中看出,这批被试的父母年龄在50岁左右,原因可能是:在同龄人当中,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担当了很重要的社会角色。无论是从事专业工作还是担任行政职务,都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同孩子在一起,因此,没有太多的机会对孩子的思维和推理能力产生有效的影响。

2.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和家庭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在家庭收入与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家庭收入越高,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越低。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和家庭收入呈负相关关系。相

关程度低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与被试道德发展水平的相关程度。当然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得出家庭经济水平越高,个体道德发展水平越低的结论。但是,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样本特征,就会发现:被试正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下海经商的人应该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恰恰又很安贫乐道。也就是所谓的“体脑倒挂”现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呈反比的。这恰恰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个体道德水平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结论。

3. 被试父母的职业与道德发展水平呈弱相关关系

在父母职业与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机关事业单位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最高,企业组和农村组最低。利用皮尔森的相关分析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45和0.028,呈弱相关关系。这也许与家庭的沟通水平具有一定关系。机关事业单位的父母,从事的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需要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这种在职业岗位上获得的能力优势,使得他们在家庭里面具备了良好的沟通能力并能营造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从而促进了孩子的认知水平的发展和道德情感的丰富

4.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居住地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居住地之间,频次分布和百分比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相关分析结果同样显示,被试的道德发展水平和家庭居住地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六、结论

1. 4所高校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总体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590个样本中,12.7%处于前习俗水平,59.1%处于习俗水平,28.8%处于后习俗水平;

2. 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3. 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与家庭环境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和家庭收入呈负相关,和父母职业有较弱相关,和家庭居住地地方没有显著相关性;

4. 家庭对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即取决于父母本身具备的认知水平的高低以及将这些东西有效传递给孩子的能

力的高低。

七、建议

1. 科学评价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 能为正确预测个体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南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指出: 道德判断是道德行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元素。而道德判断是可以测量的。因此, 道德评价是为了真实科学地了解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 为正确预测个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倾向提供指南。同时, 也为针对性地实施道德教育提供信息, 是提高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前提条件。

2. 提高教师的道德推理水平, 以促进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提升

研究表明, 家庭对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的促进, 是由父母的道德发展水平以及将这些东西传递给孩子的能力的高低所决定的。因此, 在高校, 教师同样也应该具备高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以及身体力行地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 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道德角色的承担机会的能力。教师的任务就是了解每一个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 并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提供下一个阶段的推理模式, 促进其推理水平向下一个阶段发展, 以利于个体道德水平不断提高。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 教师要具有更高的道德推理水平。因此, 教育者首要的任务是教育自己。

3. 关注大学生道德水平的环境成因, 对环境因素实施有效的干预, 以促使大学生道德水平的发展向更高阶段推进

本研究验证了道德发展理论中有关家庭环境和教育因素与个体道德发展水平关系的理论。并进一

步分析了环境因素影响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运行机制。因此, 仅仅了解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是不够的, 同时, 还需要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发展的环境成因, 对不利于学生道德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进行有效的干预, 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使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L·柯尔伯格. 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21-323.
- [2] 张耀灿, 郑永廷.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72-81.
- [3] 宋希仁. 道德观通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24-131
- [4] 罗国杰. 道德建设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56-62
- [5] 戴钢书. 思想政治教育统计研究方法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90-290
- [6] ADAMS J 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3, 67: 422-436.
- [7] 张奎明, 颜景民. 西方关于大学生道德发展研究与启示[M]. 上海: 上海高教研究, 2005: 67.
- [8] LIND G Mo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M].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5.
- [9] REST J R. Designing and validating a measure of moral judgment: Stage preference and stage consistency approach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7, 89 (1): 5-28.
- [10] 杨炯, 周作云. 德育考核量化辨析[J]. 教育研究, 1998, 12 (6): 41-42.

Research on the Mo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Chengdu —Taking 4 Universities as Examples

LIU Qua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x's mo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this paper uses Kohlberg's Moral Development Model as well as DIT2 and MJT to carry on empirical researches in 4 universities in Chengdu, hoping to verify the utility of Kohlberg's theor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al development levels of 4 universities in Chengdu are optimistic, and the moral recognition leve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ir moral judgement abilities, which also has different relatives with their family factors. Therefore, university teachers' moral quality should be enhanced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moral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moral development level; environmental factor

编辑 刘波